

上海家庭教會的發展與公開性

鄧穎翹

聯宇聖經學院

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一 引言

歷史中上海是中國基督教發展的重心，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因着上海的地理位置及租界的特殊地位，許多傳教差會以上海作為在華事業的發展基地。1877年、1890年、1907年三次全國性基督教傳教士大會都在上海舉行，充分顯示出上海對在華傳教事業的重要性。¹ 1920年代起，上海成為了中國基督教的中心。到1949年，上海有367間教會，當中261間在市區，106間在市郊，大規模的教堂有20至30座，大部分設在

¹ 姚民權：《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上海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1994），頁72。

原公共租界。² 當年上海有大約4.4萬名基督徒，³ 佔全國約100萬名基督徒的5%。⁴ 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基督教的興盛並沒有頓時淹沒，1958年「聯合崇拜」運動之前，上海仍存留204間公開教會，其他大城市如北京也只有66間，廣州只有52間。⁵ 上海孕育出許多華人牧者，成為了上海基督教的重要資產。但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戲劇性變遷，已使上海基督教的狀況截然不同。今天，雖然三自兩會的總部都在上海，但很多教會由於不願受政府管制，都選擇走相對隱藏的家庭教會路線。至於「開放」的基督教堂點，數目還不及大躍進前，至2012年底只有169個，大部分都是小型堂點，而且大約八成位於郊區。⁶

今天上海是個著名國際化都市，但宗教自由情況卻落後於經濟及科技發展。處於這城市的家庭教會，一直傾向謹慎、低調，而且「各家自掃門前雪」，彼此之間缺乏連繫。過去十年卻有個別教會漸漸公開化，並銳意打破傳統，團結起來成立牧者團契，其中一個是於2012年成

² 〈第二節：差會、教派、教堂〉，《上海通誌》第14卷第6章，〈<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79044/node79331/node79340/userobject1ai103718.html>〉（2013年12月12日下載）。

³ 〈第三節：教職人員、教徒、團體〉，《上海通誌》第14卷第6章，〈<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79044/node79331/node79340/userobject1ai103721.html>〉（2013年12月12日下載）。

⁴ 1950年，全國基督教二十二個教派共有1,005,699名已受洗者。〈三年來全國基督教工作基本總結和今後工作的方針任務的意見（草稿）〉，附表一、二、三，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50目錄1案卷；轉引自邢福增：〈中國基督教的區域發展：1918、1949、2004〉，《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第3期（2007年6月），頁168。

⁵ 這些數字被一些學者所引用，不過亦有資料顯示其他不同的數字，例如根據《上海通誌》，上海在1958年初有208座教堂，其中中華基督教會22座、浸會21座、聖公會16座、衛理公會5座、救世軍2座、安息日會5座、公誼會1座、靈工團52座、自立會29座、真耶穌教會6座、獨立性教會47座；〈第二節：差會、教派、教堂〉。

⁶ 人數比例上，根據官方數字，上海至2008年底有19.62萬名基督徒（不包括在滬境外及家庭教會基督徒），只佔全國約2000萬名基督徒的近1%。張化：〈當前上海基督教研究報告〉，2009年8月8日，〈<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72>〉（2009年8月13日下載）；及〈上海基督教概況〉，2014年3月19日，〈<http://www.shmzw.gov.cn/gb/mzw/shzj/jdj/index.html>〉（2014年5月31日下載）。

立的「漁夫團契」，團契中的幾間教會亦較為外界所認識。2013年夏天，筆者深入訪談了團契的五位傳道人（目前的主要參與者），探討他們教會的公開化歷程和彼此聯結的原因，當中有三位願意公開姓名及教會名字。此外，筆者也與團契外不願公開身分的傳道人，進行了非正式訪談。

上海家庭教會的公開程度，與國內另一國際化城市北京的家庭教會相比，仍有一定距離。這是甚麼因素使然？為甚麼一些上海家庭教會又願意走公開路線？這些教會又有甚麼特徵和共通點？它們如何面對政府的壓力？本文首先追溯漁夫團契三間教會的發展歷程，並探討教會持有的理念，從而更深入了解上海家庭教會的公開性。接着，本文將更宏觀地剖析上海家庭教會的發展與狀況，並與國內其他國際化城市的家庭教會作出比較，繼而勾勒出一幅中國城市教會更細緻的圖畫。

二 上海家庭教會的發展

（一）上海金燈台教會

甲 典型的傳統教會

上海金燈台教會始建於1996年，教會的前身是一個1980年代初已開始的聚會。當年這聚會在一位老姊妹於四川北路的家中進行。有別於一般上海家庭教會，這教會是一個比較著名的半公開聚會，因為這老姊妹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她的兒子是「軍屬烈士」，在1950年代抗美援朝戰陣中身亡，因此政府對這位老人家格外寬限。後來，教會年老的帶領者因着不同原因逐一離開了，就由被栽培的年輕人補上，俞榮富牧師就在1996年開始帶領這個聚會。⁷

⁷ P02訪談紀錄，2013年8月6日。

俞牧師生長在杭州，因着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規定，姊姊到了浙江農場工作，在那裏認識了姊夫。姊夫一家都是基督徒，他們就帶了姊姊信主。後來在家的父母患病，姊姊和姊夫家人便不斷來探望，熱心地向他們傳福音，俞牧師就在這時接觸到福音。當年社會上充斥着階級鬥爭，民眾之間關係非常緊張，基督徒的真誠和愛心卻觸動了他，他便開始認識基督教，閱讀《到底有沒有神？》、《荒漠甘泉》等屬靈書籍，最後於1977年信主。當時文革的餘波未了，宗教還受到許多壓制，但他沒有任何顧慮：「那個時候二十六歲左右，年紀比較輕，沒想得那麼複雜，信主也不是公開的宣告，也沒甚麼，信主就是信主了。」

當時他開始參加「蒙頭會」的家庭聚會（即「聚會處」的教會，當年三自教會也未重開）。家庭教會在杭州相對起步較早，聚會處的教會也較有規模，他的教會常有上海的講員來講道，如李天恩、林景等。⁸ 俞牧師便在他們的教導和感染下，開始有奉獻作傳道人的心志。1982年他在單位申請自動離職，繼而做相對自由的個體工作，在教會帶職事奉。⁹ 那時他只是單純地有一顆愛主的心，沒有考慮到做傳道人的後果，因為老一輩的牧者多年為主坐牢都熬過來了。

後來，妻子為了頂替她父親在上海的職位，便遷往上海工作，俞牧師當時一年來回滬杭幾次，因着早前已認識了上海的老牧者，他在上海期間便參加他們的聚會。他在杭州時早已從一些由監牢裏出來的牧者處了解到，三自是為統戰服務的半政治組織，因此他沒有參加過三自聚會。1989年他正式到上海定居，便被介紹去參加老姊妹的家庭聚會。

⁸ 有關李天恩的事跡，可參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3), 67-71.

⁹ 他在1982年從單位自動離職，那個時候自動離職並不普遍，因為1975年「四人幫」倒台後，鄧小平開始發展經濟，社會上的單位企業開始有很多轉變，很多人開始經商。當時他的工廠有一千多人，他是第一個遞交報告要求自動離職的員工。

教會當時有七、八十人聚會，每次都把房子擠滿。後來老姊妹去世，教會便搬到其他地方。當時他已開始帶領這教會，最初他們仍是搬到信徒家中，後來就搬到飛虹路，那地方是一個做裁縫的姊妹所租的廠房，約四十平方米。後來因為參加聚會的人愈來愈多，教會便把工廠的一層租下來，直到2009年這關鍵性的一年。

乙 被公開化的歷程

2009年，教會已發展到平均約150人出席，並已有兒童主日學和年輕人聚會，250平方米的地方還是不夠用，可是當時在上海而言，已是相對大的家庭教會場地。6月份左右，政府通過民族宗教辦迫使廠房單位解除與教會的租賃合同，教會出於無奈，便決定到戶外敬拜。那一年的6月初，成都秋雨之福教會成為了國內第一間因受到逼迫，而到戶外敬拜的教會。同月，上海金燈台教會成為了第二間，也是上海的第一間，比上海萬邦宣教教會還要早。俞牧師認為，他們受到逼迫，不是因為規模大的緣故，而是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當時教會正參與一個「七彩橋聯合禱告會」。這聯禱會的緣起是2008年四川地震後，一些傳統家庭教會的牧者走在一起，發起了聯合的賑災活動，此後這些牧者就定期聚會，一起禱告、彼此交流。「上海金燈台教會」這名字，也是當初為了教會之間有更好的往來而起的，意思就是成為「為主發光」的教會。俞牧師是聯禱會的發起人之一，這自然引起政府的關注。第二，那一年是2010年世博會前夕，上海就如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時一樣，當局事前以安全為理由，清理市內的家庭教會，背後當然是特別想把較大型的教會化整為零。

當時俞牧師想到，現時社會上羣體事件愈來愈多，農村也好，城市也好，動遷也好，強拆也好，徵地也好，處理不當的話，就會產生很多社會問題。以前黨書記是第一把手，現在弄得不好的話，不單市長會被責罰，書記也會被瀆職論罪，兩人的烏紗帽都保不住。金燈台的聚會地點也不是在上海的偏僻地區，而是在市區，所以若有事情發生，市

長和書記的壓力還是很大的。當時俞牧師就想：「他們的目的當然是希望你化整為零，不讓你浮出枱面，不讓你們有更多的影響力，走向公開化。……如果我們教會受衝擊、化整為零了，後面的其他家庭教會也會一樣，一個個地被對付下去。」而且他強調信仰自由是他們的基本權利，是法律允許、憲法規定的，所以當時教會就不管其他，只堅持最基本的底線：「你把我們這裏取締了，也沒有好好的解決，我們沒有地方聚會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無奈，只有在戶外崇拜。」¹⁰

所以，教會就從6月起，在教會斜對面的一個公共地方戶外敬拜。那地方是地鐵站出口處，早上很多人在做運動，晚上很多人在唱歌，是個人流很多的地方。當然不是每一個會眾都贊同戶外敬拜，不過最後也有大約130人出席。俞牧師當時已與會眾溝通好，若警方來衝擊，他們要怎樣面對：「我們當時有一百多人，他們要來兩、三百人才能鎮得住。他們若真的來，我們就講好，任何人不要和他們起暴力衝突。他們來清場取締，那我們每個人就拿着自己的小凳子，我們就走，今天聚會就結束，下個禮拜照常。」

戶外敬拜持續了約五個月，期間小組聚會沒有間斷。俞牧師認為，小組在這段時間發揮着重要的功能，組員仍有平台彼此勉勵、禱告、堅固，可讓教會不致成為一盤散沙。有些本來沒有去戶外敬拜的組員，後來也去了，當然也有些組員最終離開了教會。不過，他們並不是因為受到政府直接逼迫而離開的。由於教會沒有在網上發布有關戶外敬拜的訊息，採取了比較低調的姿態，崇拜便沒有受到衝擊。這段期間，政府只是向牧者和同工施壓，但他們並不害怕，所以政府也沒有辦法。

在街道上敬拜了幾個月後，由於天氣逐漸轉涼，教會開始考慮到在寒冬中敬拜，始終對年紀大和身體弱的會眾不好（會眾的平均年齡為

¹⁰ P02訪談紀錄。

四十多歲），而且有會眾認為他們不是「馬路教會」，教會始終需要有自己的會堂，因此經過溝通和禱告後，教會就作出了購堂的決定。之後，他們只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就順利在虹口區四平路買下一個商廈單位，裝修了一個月後，就搬了進去。整個過程政府也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教會再沒有在街道上聚會，他們才知道教會已買了房子。

最初，當地派出所欲以消防不及格為理由阻撓他們，後來區政府介入處理。他們採取的是較溫和的做法，他們對俞牧師說：「老俞啊，現在你們有會堂，你們太太平平聚會，不要給我們找麻煩就好了。」從那時開始，教會大致上都能平安地在那地方聚會。不過有些時候，俞牧師多少會面對政府的壓力，例如2010年他被禁止前往開普敦洛桑會議，從機場被押送回家；2011年北京守望教會事件發生後，他因簽署了《我們是為了信仰：為政教衝突向全國人大的公民請願書》而被問話等。¹¹俞牧師強調，教會不參與政治，也絕不會做反對政府的事情，更多的逼迫他們也不怕。

他說教會是山上的城，世上的鹽和光，因此教會要公開化。因為這個緣故，他們選擇了在寫字樓聚會。他說自從他們買了這會堂之後，上海很多家庭教會都開始在寫字樓聚會。其中一個原因是在2009年，上海有個別家庭教會也受到逼迫，他們就走在一起，組成了另一個教牧聯禱會——「百合聯禱會」，藉此平台彼此支持。聯禱會最興盛的時期，也有大約四十間教會參與。俞牧師在聯禱會中，也有推動家庭教會要公開化的意識，故此有些教會亦開始慢慢公開化。不過在社會的層面，俞牧師說目前金燈台教會公開化的舉措還是不多。即使他們在2009年戶外敬拜了幾個月，也沒有引起傳媒關注，就連對華援助協會那一年的《中

¹¹ 17位牧者：《我們是為了信仰：為政教衝突向全國人大的公民請願書》，2011年5月13日，<<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1/05/201105130242.shtml>>（2011年8月19日下載）。俞牧師的名字在請願書被錯寫為「余榮富」。

國大陸境內基督教家庭教會遭受政府迫害的年度報告》也沒有提及。教會未有自己的網站和刊物，但會朝着這方向發展，至少在七彩橋聯禱會的圈子中出版一些文字資料。

截至2013年夏天，金燈台教會已發展到近二百人，並有三位全職傳道。除了四平路的聚會點，兩年前教會也在崇明島開拓了事工，2012年在買下的民居開始了主日崇拜。這是教會的一個外展工作，教會也希望將來能夠更多植堂，進一步拓展福音工作。至於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教會則尚未展開，不過七彩橋聯禱會正醞釀合力支持宣教士，因個別教會的資源不足以獨力支持。可見，金燈台教會正透過不同的網絡平台，拓展各式各樣的事工，彰顯教會的不同面貌。金燈台教會可說有雙重特質，本質上是傳統家庭教會，但同時具有新興家庭教會的特質。¹²正如劉同蘇所說，金燈台教會開創了傳統家庭教會維權式戶外聚會的先例。¹³「傳統」與「新興」的界線，已變得愈來愈模糊，而金燈台教會，可說是促使這分類模糊化的一個教會。

¹² 「新興家庭教會」指近二十多年間崛起的家庭教會，這些教會一般與「傳統家庭教會」成對比。有關傳統家庭教會與新興家庭教會的差別，可參如于建嶸：〈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合法化研究〉，《戰略與管理》第3/4期（2010年），〈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_ID=2470〉（2011年4月14日下載）。于建嶸在文中指出城市新興家庭教會有六個特點：（1）獨立性很強，不受三自教會約束，與傳統家庭教會也沒有隸屬關係，橫向聯繫剛起步；（2）沒有歷史包袱和傳承，根基很淺，絕大多數教會還沒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購買寫字樓來進行宗教活動；（3）公開化程度高，信仰公開告白，信徒公開聚會；（4）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領階層，文化層次較高，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佔有一定比例，有些教會就是由大學生團契發展起來的；（5）強調教會建制和組織管理的民主化；（6）重視政教關係建設，積極主動地與政府對話，主張教會在三自教會體系之外進行登記。

¹³ 劉同蘇：〈平民家裏的金燈台——上海金燈台教會戶外聚會的意義〉，2010年1月28日，〈<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pinglun/20100128/892.html>〉（2011年4月17日下載）。

（二）上海萬邦宣教教會

甲 從三自到家庭

上海萬邦宣教教會由崔權牧師於1999年創立。崔牧師出生於吉林，是朝鮮族人。他是第四代基督徒，媽媽是傳道人，但媽媽在文革期間被禁止聚會，直到1970年代末才重新開始聚會。那時她偶爾會向崔牧師傳福音，但他一直沒有接受。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突然想尋找上帝，於是去了教會，但去了三個多月也沒有真正遇見上帝。直至1993年8月，他騎着的摩托車跟汽車相撞，導致雙腿骨折躺在醫院。媽媽來到後，一邊安慰他，一邊在上帝面前禱告，然後跟他說：「沒有關係，這是好事，可以藉着這個事情，你回到神的面前來。」當時雙腿就像被麻藥打過一樣，沒有疼痛了。那一天他就經歷了上帝，並開始思考人生：「如果那次車禍是正面相撞，我就會死了。人死了，會怎麼樣？那一瞬間，我死了之後會到哪裏？二十九年過去了，我的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我的人生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他躺在床上的兩個月，就一直思考着這些問題。他也開始聽一些講道錄音和讚美詩，聽詩歌時也覺得很安慰。¹⁴

那一年11月，他認識的一位外教向他傳福音，這位老師是美籍韓國裔宣教士，當老師提到耶穌的名字時，他就說：「這個耶穌，我要信了」，於是就做了決志禱告。當時他很清楚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他知道爾後他的人生會不一樣。然後，他們談到深夜兩點，之前他經常失眠，但是兩點後他就睡着了。他感覺睡了很長時間，睡醒之後，他就覺得整個人生已不一樣了。那時他是做生意的，但因為仍拄着拐杖不能上班，他就想既然信了耶穌，就不如好好學習祂，認識祂。於是1994年初，他到了家鄉的「傳道人培訓中心」讀書，他的同學大部分是傳道人，只有

¹⁴ P01訪談紀錄，2013年7月30日。

他一個是初信主的。他學習了一星期後，就已想他可能要做傳道人了。但是他內心有很大掙扎，一方面想學習耶穌，另一方面卻拒絕祂。在這掙扎的過程中，他認識了幾位朋友，他們對他有很大幫助，他就覺得上帝是在一步步地調整他，包括他的品格、個人生命等，這個過程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直至他12月畢業為止。

1995年，他跟老師到長春一所大學協助他的工作，大約半年後，他就考上瀋陽的東北基督教神學院，開始讀神學。由於媽媽是三自教會的傳道人，他一直接觸的都是三自教會，但是因為當時他剛信主，他只看到教會治理上的問題，而看不到神學上的問題。直至他進了神學院後，才發現三自的神學是自由派神學，而且否定宣教士的工作。當時他也有跟他的外教老師和另一位導師學習，他就發現他在神院所學的，與他們所教導的有衝突。後來，他看到神學院有宗教局的官員來講課，他們會講一科「宗教比較」，講解各大宗教的興衰，他們的教導到最後還是：你必須聽話，與政府合作，在政府的指導下，你才可以做大教會，做有作為的教會等等。聽得明白的人，就會知道三自神學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讀書的幾年中，他也走訪了很多教會，每個假期都會去，最後到過差不多二百間，他就慢慢知道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別。後來1999年畢業的時候，他有兩個很清晰的目標：第一，要脫離傳統教會；第二，要脫離三自教會的體系。他認為只有離開東北才能脫離傳統教會，去到一個新環境，進入家庭教會的體系當中。當時有位同學介紹他到上海牧養一個剛開始的團契，他就向上帝禱告：「神啊，祢既然讓我去上海，祢得給我一句話。」上帝就給他馬太福音十章16節：「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羣，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他就一面思想這段經文，一面帶着家人來到上海，牧養一個十七人的團契。團契的弟兄姊妹都是從東北來打工的朝鮮族人，因為之前沒有人帶領，所以只是間歇性聚會。現在崔牧師就把團契轉型為教會，並把教會命名為「上海朝鮮族教會」。

乙 一枝獨秀的教會

教會開始的時候，在浦東浦上路一個廠房裏聚會。一年後那地方面臨拆遷，同時他們發現在浦東居住的朝鮮族人不及浦西的多，於是他們就決定搬到浦西。當時他們要用六個月的時間才找到房子，因為很多人不認識基督教，知道是教會聚會用的，怕惹上麻煩，便拒絕他們。最後，教會在浦西七莘路找到一間很破舊、已倒閉的酒店，他們把原本跳的土高的地方改裝成禮堂，唱歌的房間則改成查經房。搬過去的時候，教會已發展到九十多人。搬過去以後，崔牧師很快發現有漢族人在聚會，就問他們：「你們不懂朝鮮語，為甚麼要來？」他們說：「這裏氛圍好啊。」那天他就發現有七個漢族人在他們當中，他就宣布：「過了這個禮拜，再下一個禮拜有中文的聚會，願意來的，你可以帶朋友來。」從那時開始，教會便有兩個主日崇拜，一個是朝鮮族的，一個是漢族的。

教會在七莘路聚會了兩年，就被通知那地方要拆遷，教會必須在三個月內找到新地方。當時教會的財政只有二萬元，但搬遷委員會經過禱告後，決定憑信心找地建堂。最後他們在吳翟路租了一塊地，然後建了一座近1,600平方米的禮拜堂。當時建堂需要六十多萬元的經費，但教會僅僅用了五個星期的時間，就從弟兄姊妹的奉獻中籌得這筆資金，而且整個建堂工程最終可於三個月內完成，他們都深刻經歷到上帝的能力。¹⁵ 2003年6月8日，他們就正式開始在新堂聚會。

可是，他們在禮拜堂聚會了三年後，因着虹橋機場要進行擴建，教會又再一次要面對拆遷。在吳翟路的那三年裏，崔牧師面對三個重大壓力：第一，當時他們在做門徒訓練，訓練出來的弟兄姊妹卻沒有合適的事奉崗位。第二是建了禮拜堂後，教會的開支增加了許多，所以教會的財政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入不敷支。第三，教會建堂後就從二百人

¹⁵ 崔權：《地乾了》，第三章（未刊稿）。

發展到三百人，但到了三百人後就不再增長，作為主任牧師壓力便相當大。他反覆檢討他的問題在哪裏、教會的問題在哪裏。其間，他在2005年7月參加了韓國釜山豐盛教會的「建造健康教會」牧者培訓，使他認識到「用雙翼飛升的健康的細胞教會」的教會模式，他就想可以把曾接受門徒訓練的弟兄姊妹，安排在細胞小組中服侍。8月他也參加了一個特會，會上講員給他接手禱告，之後他回到教會為弟兄姊妹禱告，他們的生命也發生改變，有很多靈恩的現象出現。12月31日，教會舉辦了第一次「全人醫治退修會」，那一天有很多「突破性」的聖靈工作。翌年6月，教會開始建立細胞小組，各小組很明顯感受到聖靈運行的能力，此後教會的增長就突飛猛進。2006年當他們要搬遷的時候，也在吳中路選擇租用一個更大的地方。

崔牧師表示，教會的真正增長是從2006年開始的，當年教會有三百人，到2009年註冊會友有大約三千人，聚會一千五百人，而這三年半的突破性增長，聖靈擔當極其重要的角色。¹⁶ 他說當時萬邦在上海家庭教會中是「一枝獨秀」的，而且是中國最大的整體聚會的家庭教會。教會的異象是「眾聖徒成為基督工人」，而當時教會的目標是「共同成就333世界福音化的大使命」，就是到2025年，培養出三十萬中文細胞小組組長、三萬朝鮮語細胞小組組長、三千英文細胞小組組長。如此，教會必發展成為一間巨型教會。¹⁷

丙 從取締到轉型

萬邦教會的發展和牧者的影響力，自然引起政府高度關注，2009年政府就殫精畢力地打壓他們。之前教會面對過三次打壓，一次在七莘

¹⁶ 王怡形容萬邦教會是「靈恩色彩的福音派城市新興教會」。劉同蘇、王怡：《觀看中國城市家庭教會》（台北：基文社，2012），頁32。

¹⁷ 崔權：〈上海萬邦宣教教會被取締的事件中教會和領袖的反應及出路——使徒行傳1:8節的教會在使徒行傳8:1節的環境中的生存和繼續發展使徒〉（君司大學暨神學院教牧學博士論文，2013年），第四章。

路，兩次在吳翟路，但打壓的力度不大，因為當時教會的規模也較小，後來經調整後都過渡了。教會曾設立自己的網站，但被當局關閉了。教會也曾六次向政府申請獨立登記，但都被拒絕了。2009年2月，萬邦教會亦面對一次威脅，當時「第四屆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牧師團契研討會」將要在萬邦教會的場地舉行，但在會議前一天，官方命令會議取消。最後會議決定移師到其他地方舉行，以免為教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但即使他們改了地方，警方還是勒令房東於一個月內終止與萬邦教會的租約。¹⁸ 崔牧師強調通過對話解決問題，¹⁹ 那次最後也沒有使他們失去場地。

但到了11月，教會就面對前所未有的打壓，因這次是中央直接下令要取締教會。²⁰ 11月2日，四個政府部門共派出三十多位官員進入萬邦教會，指控教會「非法聚會」，並勒令聚會立即停止。教會的主要同工亦被帶往派出所問話，並被禁止參加教會的聚會。²¹ 翌日，多個政府部門共派了五十多人，到教會進行聯合調查。²² 自這兩天的大規模壓迫後，網上媒體連日追蹤事件的發展，²³ 教會也主動發放〈萬邦宣教教會

¹⁸ 劉同甦：〈上海當局欲剝奪萬邦宣教教會的崇拜權利〉，2009年2月12日，〈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331825&language=big5〉（2009年11月8日下載）。

¹⁹ 〈河南和上海分別有家庭教會被阻止聚會〉，2009年2月13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religion_christian-02132009105745.html/story_main?encoding=traditional〉（2009年2月15日下載）。

²⁰ POI訪談紀錄。

²¹ 〈宗教迫害急劇升級上海萬邦宣教教會被取締〉，2009年11月4日，〈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958〉（2009年11月8日下載）。

²² 崔權：〈上海萬邦宣教教會被取締的事件中教會和領袖的反應及出路〉，第四章。

²³ 如〈宗教迫害急劇升級上海萬邦宣教教會被取締〉；〈上海取締萬邦教會學者指當局行為荒謬〉，2009年11月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ohui-11052009100629.html>〉（2009年11月8日下載）；李平：〈關注上海封殺家庭教會〉，《蘋果日報》，2009年11月5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art_

告公眾書〉及提交了〈萬邦宣教教會給市長的陳述呼籲書〉，²⁴ 並委託了李柏光律師提起行政覆議等。²⁵ 如此，萬邦教會也就成為海內外更多人關注的教會，特別是當教會成為了另一間戶外敬拜家庭教會的時候。

事緣11月4日，政府發布「取締非法宗教活動場所」告知書，宣稱五位牧師是「非法傳道」。²⁶ 11月11日教會的大廳已被封鎖，²⁷ 次日晚上政府部門來了一百多人圍堵教會樓下，禁止信徒參與教會的禱告會，信徒於是冒雨在停車場聚會。²⁸ 教會的房東因遭到政府施壓，要求教會

main.php?iss_id=20091105&sec_id=15335&subsec_id=15336&art_id=13387459&cat_id=3477722&coln_id=6453400> (2009年11月8日下載)；〈當局誓將教會逼入家庭 京滬兩地教會首當其衝〉，2009年11月9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ohui-11092009093924.html>> (2009年11月11日下載)；〈上海當局掃蕩萬邦宣教教會人人過關〉，2009年11月12日，<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067> (2009年11月14日下載)；〈上海萬邦宣教教會告公眾書以及給市長的陳述〉，2009年11月13日，<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089> (2009年11月14日下載)；〈上海當局打壓萬邦教會升級強行佔領教會散佈假資訊〉，2009年11月15日，<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098> (2009年11月16日下載)；〈萬邦教會六百信徒敬拜 抗議當局奪取家園〉，2009年11月16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bang-11162009095848.html>> (2009年11月17日下載)；〈上海萬邦教會委託李柏光律師提起行政覆議〉，2009年11月17日，<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123> (2009年11月18日下載)；〈上海信眾露天敬拜 六教徒遭傳喚〉，2009年11月23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ohui-11232009095143.html>> (2009年11月25日下載)；〈萬邦教會劉至勤牧師就受到傳喚及其他傷害提起行政覆議〉，2009年11月27日，<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227> (2009年11月28日下載)；及〈萬邦教會八百信徒露天敬拜 牧師被拘禁15小時行政復議〉，2009年11月29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infen-11262009094541.html>> (2009年11月30日下載)。另可參劉同蘇的分析：〈不准合法與不准信主——關於「萬邦」事件的分析〉，2009年11月19日，<<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gonggongshenxue/20091119/604.html>> (2011年4月14日下載)。

²⁴ 〈上海萬邦宣教教會告公眾書以及給市長的陳述〉。

²⁵ 〈上海萬邦教會委託李柏光律師提起行政覆議〉。

²⁶ 〈上海當局掃蕩萬邦宣教教會人人過關〉。

²⁷ 〈上海當局掃蕩萬邦宣教教會人人過關〉。

²⁸ 〈上海當局打壓萬邦教會升級強行佔領教會散佈假資訊〉。

11月14日下午4時前搬走，此外政府也在教會附近設立了一個三自教會聚會點，並號召教會的信徒到那裏聚會。²⁹ 但教會堅持「不可停止聚會」，以及憲法賦予他們信仰自由的權利。³⁰ 11月15日，教會第一次在主日戶外敬拜，約六百名會眾在政府為萬邦信徒新設的「閔行區七寶基督教聚會點」門前聚會，在場的多名政府工作人員在旁拍攝。³¹ 一星期後，五百多名會眾轉而在閔行區體育公園敬拜，這次教會的六名牧師和同工被當局帶走。³² 到了第三個主日，教會在同一地點敬拜，約八百名會眾出席，比前兩周為多。³³

可是到了12月，有關萬邦教會的報道卻銷聲匿跡。原來之後教會的牧者一致地有了同一個領受：分散到家庭聚會去。回顧那次的取締，崔牧師說被打壓的原因很簡單：「共產黨的體制不允許我們變大，共產黨對任何體制外的羣體只有兩個事情，要麼是打壓，要麼是收編。如果它覺得你夠大了，威脅到它的時候，它就要把你收編到三自裏面，如果收不到三自裏面來，它就會把你們消滅。」³⁴

崔牧師說，萬邦教會與守望教會不同，他們沒有一個十分堅持的路線。³⁵ 當時他就求問上帝：「祢到底想要對我們說甚麼？」2010年2月，崔牧師開始進行四十天的禁食禱告，向上帝求問教會的方向。上帝就很清楚告訴他：「要接受苦難，吸收苦難」，然後祂會繼續向他們

²⁹ 〈上海當局打壓萬邦教會升級強行佔領教會散佈假資訊〉。

³⁰ 〈上海萬邦宣教教會告公眾書以及給市長的陳述〉。

³¹ 〈萬邦教會六百信徒敬拜 抗議當局奪取家園〉。

³² 〈上海信眾露天敬拜 六教徒遭傳喚〉。

³³ 〈萬邦教會八百信徒露天敬拜 牧師被拘禁15小時行政復議〉。

³⁴ P01訪談紀錄。

³⁵ 不過他也十分支持守望教會，他也是《我們是為了信仰：為政教衝突向全國人大的公民請願書》的簽署人之一。17位牧者：《我們是為了信仰：為政教衝突向全國人大的公民請願書》。

說話。那一年，教會的確經歷許多困難，也陷入了一個誤區。當年是上海世博會，教會就以為是因為世博的緣故，暫時被打壓，世博之後會好轉。當時政府和公安也是這樣跟他們說。所以，教會就等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這一年聚會沒有停止，但很多工作都停頓了，因為他們盡量不給政府找麻煩。在這過程中，教會的損失很大，原本可以做更多事情，但只有海外宣教工作是增加了。此外，教會的人數也有虧損。政府的打壓力度相當大，有關部門找了教會的信徒談話，甚至用謠言、恐嚇、威脅、強迫在設定文件上按手印等手段，迫使很多信徒離開了教會。³⁶ 所以，教會曾一度只剩下五百人。

當時，崔牧師正修讀一個教牧學博士課程，他想過要放棄寫論文，因為他覺得已沒有意義，但是他的老師堅持要他寫，而且要寫萬邦教會的故事，結果他就沉下心來寫了。撰寫期間，他發現西方教會沒落的原因是過分制度化和章程化，他認為把上帝和教會限制在神學框框裏，只會使教會愈走下坡。於是他就很清楚上帝給他的方向是甚麼：不要走西方教會的老路，要走中國教會的新路。這不是說不要「組織」，而是不要過分「組織化」。而且要由禱告決定事情，不是過度章程化。

另外，當時教會認為，若要做宣教的教會，就一定要有「隱藏的部分」，而且大型教會很難同時在中國正常地發展，又進入宣教禾場。所以，他們就開始把教會分散在不同地方聚會，逐漸形成現在的「多點聚會模式」。這一切都是他們被打壓之後慢慢領受到的，最後他們就從2012年開始正式轉型。這樣的轉型已不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發展。當年崔牧師剛開始做「細胞小組」的時候，他有一個很大的願望：建立中國最大的教會。他的確也建立起了家庭教會中最大的「單體教會」，但後來他發現，這種成功的願望，正正就是上帝要對付的事情。過程中，崔牧師經歷了一段很痛苦的時期，因為他必須將以往他認為成功的模式捨棄。

³⁶ 〈上海萬邦宣教教會告公眾書以及給市長的陳述〉；及P01訪談紀錄。

截至2013年夏天，教會已回升到六百人，並散布在十個地方聚會，有九位全職傳道。他們現在的理念是「大教會，小聚會」，即使他們在個別寫字樓有聚會點，但都是很小的規模。至於目標則從「共同成就333世界福音化的大使命」，變為一個更清晰的目標，不過目標其實仍然相當宏大：在上海每一個地鐵相交的地方都有聚會點，每座大廈的會議室都有小組活動。崔牧師說他們會在上海「遍地開花」，未來教會的講道信息、培訓教材都會製成影像，廣泛流傳。可見教會雖已轉化為小聚會模式，但骨子裏的宏大理想，並沒有被外在的顛覆完全沖淡。

表一：萬邦宣教教會歷年聚會場所的轉變

日期	場地類型	地址
1999年6月	廠房	浦東新區浦上路763號
2001年4月	酒店迪廳	閔行區七莘路3700號
2003年2月	自建會堂	閔行區吳翟路303號
2006年11月	酒店	閔行區吳中路2708號
2009年11月15日	街頭	閔行區七寶基督教聚會點門前
2009年11月22日及29日	公園	閔行區體育公園
2009年12月至今	寫字樓、居民樓、商住兩用房	分布在上海多個地點

（三）上海聯合教會

甲 理想的轉化

上海聯合教會的前身由李崗牧師於2004年成立。李牧師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已半個世紀。在文化大革命的尾巴、改革開放的核心下成長的他，被共產主義的理想影響很深。因此，他從小就有一個宏觀的抱負：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出水深火熱。他就在

複雜和混亂的背景下「懵懵懂懂」地尋找出路，上下求索。他研究《周易》、《老子》、《莊子》、《論語》甚至佛教，但都不是他要尋找的真理。³⁷

1985年，他從上海財經大學畢業，由於當年能進大學的人很少，畢業後他立即被分配到上海市政府部門工作。1980年代國內正掀起一股「文化熱」，他就獲派研究社會和人類發展的文化因素，在研究的過程中，他結交了一些推動民主的朋友。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他沒有受到牽連，因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和經濟，但他的思想也多少受到這事件影響。儘管當時他在政府的核心部門工作，但他早已厭惡官場那一套，他的思想也傾向改革和開放，所以他決定改變方向，1991年出國到日本，學習日本的發展和文化。

到了日本後，他的太太突然發現患上腦癌，這使他更多思考人生問題，而不是豪情萬丈的中華民族、人類前途的問題。太太是他的大學同學，很能幹，被國家重點培養，卻逃不過死亡的事實，這使他思想：「人為甚麼那麼脆弱？人活着到底是為了甚麼？人為甚麼會死？」那時他有兩個大學同學向他傳福音，他也開始參加日本一間五旬宗教會的聚會，最後終於找到他找了半生的真理。他原來的夢想是要拯救人類，這夢想一直如原子彈內核的動力般強大。當時他就想：「我是為一個千年萬年的夢而來的，今天這個夢，終於很清晰地在我的生命中開始了，所以我就無怨無悔。」他認為服侍主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要無怨無悔地一路走下去，再大的困難、再大的事情都不會影響他。他開始想以講解聖經作為終身工作，當時他在美南浸信會的牧者門下接受門徒訓練，也得到事奉的機會。後來他得到一個異象：「福音出口」四個字，他便覺得福音進入中國的時代到了。當時他也看到報道，河南一位教會領袖被公安局打死了，他就說：「行，我要回去了，讓他們打，再打死一個，看看他們到底能打死多少傳道人。」於是他就回國建立教會。

³⁷ P03訪談紀錄，2013年8月13日。

1996年他回到上海，最初他不認識任何弟兄姊妹，所以到了衡山路的國際禮拜堂聚會，那時他還不知道有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別。他感到中國有這樣的公開聚會是好事，可是他參加了幾次崇拜都對講道不滿意，他覺得整個四十分鐘的講道都與經文扯不上關係，經文只是一個題目，揮一揮而已。那時每次聚會結束後，很多人都聚集在禮拜堂的花園聊天，在沒有話題下，只好討論對經文的看法。沒多久就有很多年輕人圍着他，他們跟他說：「這樣吧，李弟兄，我們到你家去聚會吧，聽你講算了。」就這樣他就開始當一個「家庭教會」牧者，在家裏開始了一個十多人的聚會。李牧師說當時弟兄姊妹很渴慕真理，只要有能講解聖經的人就能吸引很多人（當時互聯網不發達，弟兄姊妹不容易聽到好的講道），於是他那十四平方米的家很快就座無虛席，連床上也坐了八個人。因着空間的限制，教會最多只能發展到三十多人。

後來，有一位從香港來的姊妹了解到他們的情況後，就替教會借了一個更大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徐家匯的一個住宅會所裏面，空間擴大了，教會很快就躍升到一百多人。可是後來跟他合作的同工犯了嚴重的罪，但又不知悔改，他和第二任太太就決定退出，到「以琳」學習和服侍。他在以琳認識了一位台灣姊妹，這姊妹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很希望在學院成立一個團契，「翻轉」學院裏的不道德風氣，李牧師便從大約2002年開始在團契參與服侍。這團契發展迅速，很快就有四十多位師生參加。不久那姊妹要放下事奉，就由李牧師接手帶領，這團契就是上海聯合教會的前身。後來有一次，李牧師在團契講到「底波拉之歌」，弟兄姊妹都很喜歡「雅億」這人物，於是就把團契起名「雅億教會」。

乙 聯合教會的成立

2007年，上海聯合教會正式成立。事緣當年李牧師認識的兩位牧者，因在各自教會的服侍都到了瓶頸，會眾便要求他們退下。正當他們打算退休的時候，李牧師就想他到過他們的教會客串講道，兩間教會的會眾也很認可他，於是就提出三間教會合併的建議，兩位牧者也不用告

老還鄉了。當時還有一些撐不下去的小教會也跟他們合併，最多的時候大概有來自七間教會的成員。各教會都把自己原來的名字除掉，然後重新取一個名字：上海聯合教會。初合併時教會大約有150人，但想不到兩、三年後，教會因各種原因又四分五裂了，最後只剩下李牧師一人把「聯合」的旗子扛着。

教會的分裂，其實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這個城市中有太懸殊的階級。合併後教會既有農民工，亦有中產人士（李牧師稱為「白骨精」：白領、骨幹、精英），甚至高端人士。內部結構的差異自然引申出許多問題，包括草根階層的自我邊緣化，以及會眾對講道素質的要求。有會眾因為認為自己太低層次而離開，亦有牧師因為講道不受歡迎而退出。結果，教會剛在2007年中國福音大會上宣布成立，成為會上一大「亮點」，想不到往後三年卻相繼有牧者離開，留下來的會眾則大部分是雅億教會的人。這事以後，李牧師開始改變領導作風，以前教會是集體領導，現在他決定當教會仍在二百人以下的時候，就採取獨裁制，就連同工會也省掉了。³⁸

分散後的幾年，聯合教會一直維持在一百多人，他們所租用的場地都是十分公開的，包括電影院和龍之夢購物中心。在購物中心裏，他們唱詩歌時半層商場都可聽到。至於現在的場地，則是中山北路柏斯琴行中的一個音樂廳。2011年，網上也出現一系列有關他們的報道。³⁹ 李

³⁸ 李牧師說他的背景是五旬宗和美南浸信會結合，他也曾在以琳團隊事奉，但教會沒有特定的宗派制度和神學立場。不過教會有十六個字作為方針：「神國為重，耶穌為樣，聖靈為師，聖經為準」。他說教會不算是靈恩派，但會鼓勵弟兄姊妹說方言，包括聚會中也可以說，因為方言是屬靈的開啟。神蹟奇事也是經常有的。PO3訪談紀錄。

³⁹ 〈上海聯合教會主日證道：做人要心口合一言行一致〉，2011年6月22日，〈<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6/22/2772.html>〉（2013年11月13日下載）；〈上海聯合教會牧者教導信徒如何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智慧人擁抱愛，擁有愛，活出愛，愚昧人擁抱恨和罪〉，2011年7月26日，〈<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7/26/2943.html>〉（2013年11月13日下載）；〈上海聯合教會牧者教導信徒錢的身體是意念——當人所願的

牧師認為，他能夠這樣公開，主要是因為他的個性，而不是他的特殊背景：「可能這是我的個性，當然有人說：這個李崗有背景，所以整個市政府啊、公安局啊……是啊，公安局兩個局長是我的同學呢，但是肯定不會有這個影響。本身我膽子大，所謂膽子大不是去闖禍，而是認定是真理的、不觸犯法律的，我們就公公開開地、堂堂正正地做，所以我們聚會從來不拉窗簾的、不關門的。」他認為教會沒有必要隱藏，公公開開也是傳福音的一個過程：「為甚麼要隱藏呢？若是新來一個人，看你們躲躲藏藏，還怕公安，就疑問：『哎，你們到底是做好事還是壞事，你們為甚麼怕公安呢？』你怕公安怕甚麼呢？怕他抓你打你罵你？能夠為主被公安打和罵，不是很榮耀的事情嗎？」⁴⁰

事實上，李牧師的背景並沒有為他免去政府的壓力。他說政府整天找他算賬，最初他們找他談關於非法和加入三自的問題，但他很客氣、很柔和地表明他的立場，也半點不讓步：「三自不是教會，三自是你們派來管我們、卡我們的。對不起，我不會去那邊。」他說威脅總是有的，特別是沒有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逼迫也是很厲害的，例如試過有警車停在聚會點門外，公安整天威脅他：「注意你出門，小心出車禍」，也試過說要取締他們等。但他並不害怕，也覺得「不打不相識」，而且事在人為，他一般都有禮有節地跟他們正面打交道，公安也從沒有打過他，現在他們也成了好朋友，甚至有公安跟他說：「李老師，將來我退休了，我到你們教會來跟着你。」李牧師認為，可能他們

合神心意時，就必成就》，2011年8月2日，<<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8/02/2968.html>>（2013年11月13日下載）；〈上海聯合教會藉「吃喝團契」帶領信徒學習愛實踐信仰〉，2011年8月14日，<<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8/14/3015.html>>（2013年11月13日下載）；〈上海聯合教會藉九個字教導信徒屬靈健康自測表——本於他、依靠他、歸於他〉，2011年8月29日，<<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8/29/3071.html>>（2013年11月13日下載）；及〈上海聯合教會教導信徒如何為財富作禁食禱告〉，2011年9月3日，<<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201109/03/3101.html>>（2013年11月13日下載）。

⁴⁰ P03訪談紀錄。

都知道他很老實，所以不會干預教會的聚會，這也是他向他們特別強調的：「如果你要干涉我們的聚會，你就自討苦吃。我今天一百個人在一起，你知道我在幹甚麼，你若不讓我們聚會，我們一百個人分成十個小組，你累死了。你要把十個小組都搞清楚，你累嗎？禮拜天不都得加班了嗎？」

當然在個別「敏感」時期，他自然是被關注的對象，特別是他也是百合聯禱會的一分子。不過後來他就明白政府針對的是他，而不是教會的聚會。例如2011年守望事件發生時，上海有四位家庭教會牧者被軟禁，李牧師是其中一位。李牧師被軟禁的時候，聯合教會的聚會沒有停止，主要也是公安替他們出點子：「他們說：『說白了，我們接到中央的命令，就是不准你出門，所以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方法軟禁你在家。』我說：『這是禮拜天，我必須聚會。』你知道他們出甚麼點子嗎？他們說：『到你家聚會呀！』我說：『那不行，我來不及通知啊，而且我們兩百個人，怎麼到我家聚會？』我們那個時候在電影院，人最多了。他們說：『叫你老婆去講啊。』那我就明白，聚會是不會斷的，他們是針對我個人的，那我就呆在家，我老婆去講道，弟兄姊妹也不用來。他們就不管了。」即使2010年世博的時候，教會的聚會也沒有受到干涉，只是他們當時正好製作了一套片子《從西安到錫安》，就有不知誰說：「太好了，世博來了！我們要把這個碟片送到以色列館、中東館去。」政府知道後自然很緊張，把碟片全部沒收了，更警告他們不可到世博場地。他們也就表示他們根本不想參加、也不會上街，就這樣過渡了世博的敏感期。

李牧師期望，聯合教會能夠成為一間有影響力的教會，不是最大的教會，也不是最有錢的教會，但能夠做到一些先鋒性、標誌性的工作。現在教會的異象就是「福音出口」，但現階段的落實是：「為榮耀的君王預備道路」。預備有兩個要點：第一，福音要傳遍地極；第二，以色列要全家歸主，就是福音向西傳的異象，這也是他們特別關心的。截至2013年夏天，教會有一百多人聚會，但其實有不少弟兄姊妹是到了

外面當宣教士的，包括以色列、喀什、雲南、青海、深圳等地，其中有些不是做宣教，而是做和以色列連接的工作，他說這些都是上帝給他們看到需要鋪墊的工作。此外，他們有一個目標，也是李牧師的夢想，就是「大衛的三十勇士」和「基甸的三百勇士」計劃。這是為了他朝一日中國福音大門打開時所做的預備工作，到時他們要聯合很多教會，把上海八萬人體育館租下來舉辦活動，而服侍的隊伍，將是聯合教會培育出來的「勇士」。⁴¹許多弟兄姊妹沒有離開教會，就是因為要跟着李牧師向着這目標走。

聯合教會有今天的公開性，很大程度上也是李牧師的背景和性格所使然。在激變的時代中，李牧師培養出一種不畏強權的風骨，對官場門道手腕的熟悉，更使他面對政權時堅韌不拔。聯合教會的公開化，使教會能夠在社會上，呈現出與其他上海家庭教會不同的形態和風格，在中國家庭教會轉型期中，扮演着一個特別的角色。

三 上海家庭教會的特點

從上述三個上海家庭教會的個案可見，有個別教會從2000年代後期起走向公開化，不論是被公開化還是自我公開化。三間教會的領導人有很不同的背景：俞榮富牧師有傳統家庭教會背景，崔權牧師有朝鮮族和三自教會背景，李崗牧師是上海人、有政府工作和日本教會背景，但

⁴¹「大衛的三十勇士」是揀選十五個家庭，和他們建立像大衛與三十勇士一樣的關係，然後希望他們也能像大衛一樣，每人再找他的三十勇士，三十帶三十出來，就是九百個。當中若有三百人留下，已是很不錯。這三百人就要有另外的關係，就像基甸與三百勇士一樣，感情不一定要深厚，但他們的方向要一致。李牧師希望，到這三百人方向一致的時候，就是中國福音的門打開的時候。一旦開放的話，他們就把八萬人的體育館租下來舉辦活動，屆時要聯合很多教會，不過那三百人將會是核心同工，每人再帶十個人，組成一個個服務隊，比如為人禱告、為人推輪椅、為人引座位、清潔打掃等，這樣就有一個三千多人的服侍隊伍。所以，他認為上萬人的聚會是可能的。P03訪談紀錄。

他們的共通點是不怕政權的壓迫，能夠在窘迫中找到生存之道，而生存中又能保持公開性和踐行福音使命。而且他們認定，宗教信仰自由是他們的基本權利。

但一般來說，上海家庭教會仍是普遍傾向低調、謹慎，即使已從隱藏慢慢走向公開化，但整體上只是到了半公開化的地步。事實上，現時不少上海家庭教會都在寫字樓、商住兩用房、酒店會議室等公共場所聚會，但這與他們的開放性不一定成正比。例如，筆者曾到訪一間位於普陀區長壽路的教會，筆者首先是在網上一封支持守望教會的代禱信中看到教會的名字，再通過另一教會的牧者聯絡上這教會，獲准參加他們的崇拜。教會在寫字樓內聚會，場地足夠容納一百多人。筆者進門後才發現，原來每位出席者都必須在門口登記，而且教會一般不接受新朋友到來。他們的做法是新朋友要先到小組聚會，待接受洗禮後才可參加教會的崇拜。所以對這教會來說，他們在寫字樓聚會，是為了有足夠空間容納會眾，而不是因為寫字樓更公開。即使教會的名字已在網上公開了，而且聚會場地也是買下的，不怕被房東解約，教會仍然相當謹慎。

從各受訪傳道人的看法，可歸納出上海家庭教會有兩大特點，第一是教會傾向低調、保守，第二是教會之間缺乏聯繫。形成這兩個特點的有三方面關鍵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因素和政教因素。以下將特別與另一國際化城市北京作出比較。

（一）歷史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上海教會的歷史背景。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多個差會、基督教機構和教會總部的集中地。經過1950年代的三自運動後，外國團體對後來的上海教會發展影響不大。不過，上海仍存留許多教會，故此有許多老一輩的本土傳道人（遠比其他城市多）。⁴² 他們經歷過

⁴² 1950年，中國各教派的26個主要教會團體中，14個總辦事處設在上海；12個合作團體中，11個在上海；12個重要文字機關中，9個在上海；8個救濟福利事業機關全在上

翻天覆地的年代，傳統教會受他們影響很深，處事就比較低調、謹慎。漁夫團契有一位從1980年代就在上海服侍的葛牧師，曾在袁沐恩的栽培下成長，⁴³ 他便有這樣的觀察：「上海過去傳道人多，老一輩的傳道人很多，很多人從監獄出來以後，大家都看到，如果我們衝出來的話，會像他們一樣『家破人亡』，所以有陰影在。」故此，上海家庭教會是有「膽怯的靈」在裏面壓制着。⁴⁴ 又例如李牧師認為：「保守有它的歷史傳統，特別覺得這個好，不捨得放。另外，在前期壓力很大，一放就受到更多的困難，所以也傾向於保守。」⁴⁵

（二）社會因素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社會因素。上海是中國的經濟、商業、金融、貿易中心。上海傳統上有不少營商的人，商人的特點就是務實、精打細算。正如余秋雨指出，上海文明的一種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⁴⁶ 外地人來到，也很容易被上海人的實用主義同化。特別是許多來到上海的外地人，追求的也只是更美好的生活，處事也比較傾向實際。這城市中的教會，也切實反映出這社會文化。劉同蘇便形容上海的教會是「市民型教會」，特點就是「務實，不想甚麼大事，實實際際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行了」。⁴⁷

海。1954年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42個常委中，25個來自上海。張化：〈上海基督教研究報告〉，2009年8月8日，<<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72>>（2009年8月13日下載）。當時上海公開教會的數目也是北京的三倍。

⁴³ 袁沐恩生於1902年，曾入讀上海北江灣的中華神學院，後於賈玉銘的靈修院受教。畢業後在上海事奉。1950年代因拒絕加入三自，被抓進上海提籃橋監獄。

⁴⁴ P04訪談紀錄，2013年8月14日。

⁴⁵ P03訪談紀錄。

⁴⁶ 余秋雨：〈上海人〉，2009年5月11日，<<http://www.sanwen8.com/mingjiasanwen/yuqiuyu/14430.html>>（2014年5月20日下載）。

⁴⁷ 〈劉同蘇牧師談中國家庭教會現狀系列報導（四）：中國家庭教會深度談：溫州、北京和上海〉，《基督日報》，2010年8月17日，<<http://www.gospelherald.com/news/den-15162-0/>>（2013年11月13日下載）。

由於上海人比較精打細算，所以當個別教會要從家庭模式，轉型到更大的公共場所聚會時，就面對很大震動。事實上，上海教會信徒的平均年齡普遍比北京高，不容易接受教會的轉變，包括經濟上的轉變。葛牧師的教會便是一個例子，他們的教會位於虹口區，屬於上海的老市區，有很多退休人士，特別是姊妹，當教會決定轉型，每月要花六千元租寫字樓時，他們都不能接受：「上海的市民很會精打細算過日子的，都是省吃儉用、存錢的。教會姊妹多，所以他們在這方面會感覺到，比如說教會要發展會增添一些設施，用麥克風，用固定的音箱，過去他們長期在家裏，這些東西不要花錢，現在因為你轉型了嘛，這些東西都是要花錢的。……這與過去不同，以前在奉獻上不在乎，不是很看重，我們現在很注重奉獻，也會教導，他們就感覺到：『我們以前上教會奉獻五塊錢也沒關係，這裏卻很強調十一奉獻，還要其他一些的感恩奉獻。』」所以，在轉型的過程中，就有很多人離開了教會。⁴⁸

上海的務實型教會，與北京的知識型教會很不同。北京作為國家的政治、教育、文化中心，雲集了各界出類拔萃的知識分子，故此北京有許多知識分子家庭教會，他們的特點是比較思辨型。有些新興家庭教會的牧者和信徒，更特別積極思考教會的社會身分和角色，努力維護和爭取教會的基本權利。⁴⁹這也是為何北京家庭教會過去在教會發展上，傾向走在全國教會的前鋒，包括注重建立組織架構、走向公開化、爭取合法地位、進入主流社會等。相對來說，上海教會就比較安於現狀，只求生存而不具拓荒性。余秋雨便指出上海文化的這種特性：「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域的強悍。」他認為上海人的精明是與怯弱相伴隨的。⁵⁰這種社會特徵，也可解釋為何上海家庭教會傾向各自為政，彼此不往來。

⁴⁸ P04訪談紀錄。

⁴⁹ 參鄧穎翹：《北京新興家庭教會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13），頁49～69。

⁵⁰ 余秋雨：〈上海人〉。

（三）政教因素

第三個關鍵因素就是政教因素，這也與上海教會的務實文化息息相關。上海教會由於比較實際，一旦意識到有危險，就會撤回陣地，固步自封。所以在教會的聯合上，還是比較小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熊月之指出，「由於多年大都市生活的習慣，上海人一般對與己無關的事不大關心，與熱情好客的北方人比起來，似乎顯得比較冷漠。」⁵¹ 余秋雨也認為，「各管各」、不管「閒事」是上海文明的一大心理品性。⁵² 這種特性，也切實阻礙了上海教會之間的聯合。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百合聯禱會和漁夫團契的經歷。2009年，上海的教會渡過了嚴峻的政治迫害，包括曾走到戶外敬拜的金燈台教會和萬邦教會，當時他們與其他教會團結起來，組成了百合聯禱會。百合最興盛的時候，有三、四十間教會每兩周聚會一次。⁵³ 當時百合比較開放，參加的人不只是教牧，還包括一些其他同工，不料有些人加入後，竟就把百合的事情完全曝光了。⁵⁴ 由於整個組織太敏感，特別是召集人都比較有影響力（如崔牧師、俞牧師、李牧師等），因此百合不斷面對政府的壓力，包括其中一位牧者（鄭牧師）的教會因借出地方作為百合的聚會地點，政府就逼迫房東要教會搬走，又把教會的椅子全丟到外面，教會在沒有辦法下只有搬走。⁵⁵ 在2011年守望教會戶外敬拜的第一周，他們有幾位牧者也被軟禁在家。那一年，百合就慢慢解散，停止運作了。⁵⁶

⁵¹ 熊月之：〈略論上海人形成及其認同〉，《學術月刊》1997年第10期，頁61。

⁵² 余秋雨：〈上海人〉。

⁵³ P03訪談紀錄。

⁵⁴ P04訪談紀錄。

⁵⁵ P02訪談紀錄；P04訪談紀錄；及P05訪談紀錄，2013年8月15日。

⁵⁶ P04訪談紀錄。

2012年，百合的五位主要牧者重新組合，成立了「漁夫團契」。⁵⁷不過其中一位牧者估計，很多牧者可能都不會參加，因為怕受到牽連：「他們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掛了號』的，在公安局那邊是留了名的，掛了名的，他們跟着我們會有一些壓力吧。」他認為上海的教會都只顧自己的一畝三分田，不管別人，這反而影響自己，因為失去戰鬥力。上海教會若有更多往來，就會更有力量，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彼此幫助，特別是現在很多教會都在轉型的過程中。⁵⁸ 崔牧師也認為，上海家庭教會彼此不太接納，很難走在一起連接。⁵⁹ 李牧師認為，上海家庭教會整體來說，是「太分裂、太保守、太膽小、太自私」。⁶⁰ 鄭牧師也認為，上海教會面臨的一個瓶頸就是合一的工作，每一間教會都自己管自己，影響的範圍有限。⁶¹ 俞牧師則比較正面：「現在上海有很多聯禱會，很多教會在一起，這也是中國家庭教會開始比較好的一方面，為教會的聯合彼此代禱，資源共享，互相服侍，共同宣教。」雖然漁夫團契中有比較「靈恩」的教會，但俞牧師認為只要真理上沒有偏差，是可以彼此包容的。⁶² 但對於一些牧者來說，神學立場的不同，仍然是他們不太願意與其他牧者往來的原因。

整體來說，儘管上海家庭教會已比以前公開和來往更緊密，但相對其他國際化城市的教會，的確還是比較謹慎和低調，這亦使他們跟不上中國教會回應主流社會的步伐。⁶³ 上海教會雖有悠久的歷史，也曾

⁵⁷ P04訪談紀錄。

⁵⁸ P04訪談紀錄。

⁵⁹ P01訪談紀錄。

⁶⁰ P03訪談紀錄。

⁶¹ P05訪談紀錄。

⁶² P02訪談紀錄。

⁶³ 〈劉同蘇牧師談中國家庭教會現狀系列報導（四）：中國家庭教會深度談：溫州、北京和上海〉。

是基督教發展的中心，但現在發展的步伐卻落後於其他大城市的教會。即使守望教會在2011年面對政府傾巢而出的迫害，北京教牧聯禱會的成員都予以支持，在4月至5月間共發出七封代禱信，呼籲各地教會加入禁食禱告的行列，為政府部門、守望教會及整體基督教會進行三餐禁食禱告。到第六封的時候，已有四十三個教會及團契參與，當中有些是成都和上海的教會，但大部分是北京教會。⁶⁴ 可見，即使北京有教會受到政治迫害，其他教會也發揮了肢體力量，彼此支持，沒有臨陣退縮。金燈台教會、萬邦教會、聯合教會的另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也積極與其他教會連結，在團結中找到支持。

2009年11月，守望教會也曾經因為被迫遷，到了戶外敬拜。那一次的逼迫沒有如2011年般的嚴峻，也不及同時期萬邦教會面對的程度，所以其他教會的回應相對較少。不過，倘若當時兩間教會面對相同程度的逼迫，相信會明顯看到上海教會和北京教會團結性的分別。這實在是上海教會需要深思的課題。

有上海牧者認為，上海政府對教會的控制比其他地方嚴厲，所以教會一般加緊提防，例如俞牧師認為：「因為上海這大都市多少年都是這樣，好像治理得比較好吧，可能控制得比較到位。所以家庭教會為了保存自己的教會，就比較隱藏，考慮事情都比較穩妥一些。」⁶⁵ 不過也有牧者認為上海是比較寬鬆的。有些認為因為三自總部設在上海，所以上海的控制比較嚴厲，有些則認為沒有關係。所以是眾說紛紜，沒有一致的看法。

⁶⁴ 北京教牧聯禱會：〈北京教牧聯禱會代禱信六〉，2011年5月12日，〈<http://www.shwchurch3.com/files/guanyuwomen/gywmDetail.aspx?cDocID=20110512004122412201>〉（2011年8月19日下載）。

⁶⁵ P02訪談紀錄。

觀乎政府對待萬邦教會和守望教會的態度，兩個城市都貫徹了中央的「維穩」政策，只要一個堂點的人數太多，就有被取締的可能。李牧師指出，曾經有政府工作人員跟他說，政府內部設定的底線是二百人，超過二百人就要嚴加關注。⁶⁶ 所以就算教會人數多，但只要化整為零，採用多堂點模式，仍不難找到生存空間，例如現在上海的萬邦教會和上福教會、⁶⁷ 北京的福音教會和城市復興教會等。當然也有例外的，如北京的錫安教會，但這或許是守望教會持續戶外敬拜所帶來的結果，因為政府不會希望看到另一樁羣體事件出現，倘若北京出現另一間戶外的「守望教會」，相信當局也難以負荷。

四 總結

1990年代後半期，見證着不少城市家庭教會崛起。2000年代，可說是中國城市教會一個很特別的時期，期間不少家庭教會迅速發展，嘗試進入主流社會，測試政府的底線。2008年四川地震，城市家庭教會在賑災上的參與，成為了另一個里程碑。那一年有關家庭教會的文章也相當多，⁶⁸ 國內外信徒、學者、媒體為教會的突破性發展感到興奮。即使北京在奧運前對當地家庭教會進行打壓，也沒有為各教會造成太大衝擊。

2009年起，全國多間大城市教會首次到戶外敬拜（2009年6月成都秋雨之福教會、上海金燈台教會，2009年11月北京守望教會、上海萬邦宣教教會，2010年4月廣州良人教會），標誌着政教關係進入另一個新階段，政府和教會都要在城市家庭教會快速興起後，重新思索和釐定兩

⁶⁶ P03訪談紀錄。

⁶⁷ 上福教會至2013年8月有二千人，分散在二十一個點聚會。

⁶⁸ 參鄧穎翹：《北京新興家庭教會研究》，頁14～19。

者的互動關係，以及教會的存在形態。藉着連串清掃行動，政府宣告了它的底線：對大堂會必須犁庭掃穴，不容教會和牧者的影響力過度擴張。⁶⁹ 萬邦教會後來有了分散聚會的領受，守望教會卻繼續堅持整體聚會，最後兩者的結果便全不一樣。

胡溫體制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執政目標，曾為教會進入中國主流社會帶來希望，但後來的「維穩」政策，卻給各地政府更有壓倒「不穩定因素」的口實。新上台的習李體制更有明顯的極左傾向，使教會必須提起更高的警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政策從「維穩」提升到「國安」，令人擔心國家會否在強調意識形態反滲透下，高度關注宗教滲透或宗教政治滲透，以致對宗教大肆攻擊。⁷⁰ 中共一直防範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進行滲透，教會的發展可能會大受影響。2010年代，是否政教關係進入更嚴峻階段的一個時期？這又會否使上海家庭教會更不敢逾越雷池一步？這時，教會之間彼此透明化，建立互信，參考各方經驗，相信是面對政權壓迫的一條自強之路。

⁶⁹ 2012年4月，對華援助協會表示，中國國家宗教局、公安部和民政部在2011年聯合下發祕密文件，制訂了分三個階段全面清除家庭教會的目標：第一階段是在2012年1月至6月，對全國各地的家庭教會進行地毯式摸底、備案；第二階段是用兩至三年時間，對已摸底、備案的家庭教會進行集中清理；第三階段是用十年時間徹底清除家庭教會。〈北京發起新一輪清除家庭教會的運動〉，2012年4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20423-beijing-launches-new-campaign-to-eradicate-house-churches-148563985/956378.html>>（2012年8月7日下載）。不過這消息的真確性未獲證實。

⁷⁰ 邢福增：〈當前意識形態鬥爭下中國基督教學術研究的挑戰（下）〉，《時代論壇》，2013年12月1日，頁11。

撮 要

今天上海是個著名的國際化都市，但宗教自由情況卻落後於經濟及科技發展。處於這城市的家庭教會，一直傾向謹慎、低調，而且各自為政，彼此之間缺乏聯繫。過去十年卻有個別教會漸漸公開化，這些教會亦銳意打破傳統，團結起來成立牧者團契，其中一個是「漁夫團契」。但上海家庭教會的公開程度，與國內另一國際化城市北京的家庭教會相比，仍有一定距離。這是甚麼因素使然？為甚麼一些上海家庭教會又願意走公開路線？這些教會又有甚麼特徵和共通點？它們如何面對政府的壓力？本文首先追溯漁夫團契其中三間教會的發展歷程，並探討教會持守的理念，從而對上海家庭教會的公開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接着，本文將更宏觀地剖析上海家庭教會的發展與狀況，並與北京的家庭教會作出比較，繼而勾勒出一幅中國城市教會更細緻的圖畫。

ABSTRACT

Today's Shanghai is a renowned internationalized city, but its state of freedom of religion lags behind it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House churches in Shanghai tend to be cautious and maintain a low profile. Their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also tends to be weak. The past ten years have seen some churches breaking the tradition, opening themselves and forming pastors fellowships, one of which is the Fishermen's Fellowship. But in comparison with house churches in another internationalized city – Beijing, house churches in Shanghai are still apparently less open. What is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Why would some house churches in Shanghai choose to be more open? What do these churches have in common? How do they cope with pressur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will firstly 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re concepts of three of the churches in Fishermen's Fellowship, thereby having a glimpse of the general openness of house churches in Shanghai. Then the paper will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and situation of house churches in Shanghai from a macroscopic view, and compare these churches to those in Beijing, thereby attempting to paint a more detailed picture of urban churches in China.